



Wholly owned by UTAR Education Foundation

从主观心理与性格探讨马来西亚华族改以官话作为母语（1980——2019）

**A Study on Subjectivity and Characteristic as Effect on Malaysian Ethnic Chinese
Switching to Mandarin as Mother Tongue (1980–2019)**

黄尧政

NG YAO ZHENG

15ALB08161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20**

目次

宣誓	iii
摘要	iv
致谢	v
第一章 绪论	1
(一) 研究目的	2
(二) 研究范围及方法	2
(三) 研究难题	3
(四) 前人研究综述	4
第二章 马来西亚华族对非官话华语族语言的误解与真相	7
(一) 马来西亚华族对非官话华语族语言的误解	7
(二) 非官话华语族语言在马来(西)亚的实况	14
2.1. 政经	16
2.2. 教育	17
2.3. 戏剧	19
第三章 马来西亚华族改以官话作为母语的因素	22
(一) 接触与通婚说	22
(二) 母语教育的丧失	24
(三) 华族的“务实”性格	28

第四章 结语.....	32
引用书目.....	33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黄尧政

姓名：黄尧政 NG YAO ZHENG

学号：15ALB08161

日期：2020年4月24日

论文题目：从主观心理与性格探讨马来西亚华族改以官话作为母语（1980——2019）

学生姓名：黄尧政

指导老师：莫德厚 师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马来西亚华族普遍以非官话华语族语言为母语；但自 80 年代起，大量大马华族开始改以官话作为母语。当地华族对非官话华语族语言的误解诸多，包括以为这些语言是方言、不能用文字书写、是低等的；事实上，非官话华语族语言早在四百多年前就已通用于当地的政、经、文、教界。马来亚华族自二十世纪三〇年代丧失接受母语教育的权利，非官话华语族语言地位受挫；华族“务实”的性格促使他们改以官话为母语。

【关键词】 马来西亚华族、非官话华语族语言、改换母语、官话、误解、务实

致谢

本论文由最初构思到最终完成，我在这整个过程中都得到了不少人或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如果没有了他们的这些助力，我就肯定须要被迫承受更严峻的挑战才可能完成这部论文，因此，我欲在此以最真挚的心向他们致以最高的谢意。

首先，我非常感激一路以来指导我撰写这部论文的莫德厚老师。他为这个题目提供了不少意见，开导我得以看见我自己事先并不知道或从未想过的方向，让我有机会往不同的道路去发展。对于我呈上的草稿，他都严格把关，每次收到他弹劾回来的稿件时都让我心惊胆跳，因为他总能指出一堆的缺点和问题等待着我去修改。所以每当他批准通过一章之后，我都雀跃万分，兴奋不已。这部论文经过他审核，就相等于被盖上了品质保证的印章，对我能力的肯定。

接着，我全心感谢我的父亲。他每天早出晚归，辛劳工作，供我衣食住行上的种种费用。因为他，我才能这样不必为钱财烦恼，而专心一致地放在论文上。

另外，我还要感谢我的祖父母。自小与他们住在同一屋檐下，让我有机会好好地认识及了解自己族群的语言与文化。如果不是这样的成长环境与经历，我就很可能不会想到要探讨华族抛弃母语的原因了。

此外，我也特别感谢我妹妹、弟弟、辜昕瑜、郑宇航、黄宇轩、王声建、袁绮嫒等一众朋友给我的关心、鼓励与支持。

第一章 绪论

如果要问人们——无论当地或外国人——马来西亚最显著的特质是什么，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回答：多元。这种多元除了体现在族群、宗教、文化、及饮食以外，还有一点非常明显的就是语言。语言这方面的多元，除了异族之间使用着不同的语种，各族群内部的语言使用情况更是五彩缤纷。

马来语除了官方语言国语之外，从大马北部到南部，西海岸到东海岸，马来半岛到沙巴及砂拉越，各个州都几乎有各自不同的方言与口音（loghat），甚至还“土生华人”（Peranakan Chinese）及仄迪人（Chitty）以马来话为主体语言再混合各自的母语——泉漳话及淡米尔话（Tamil）——而衍生出的峇峇马来语（Baba Malay）及仄迪马来语（Chitty Malay）。至于达罗毗荼族（Dravidian）虽然以淡米尔人的淡米尔语占绝大多数，不过泰卢固人（Telugu）和马拉雅利人（Malayali）分别所使用的泰卢固语及马拉雅拉姆语（Malayalam），也在特定的地区流行。此外，更别忘了旁遮普人（Punjabi）的旁遮普语，以及本国各土著原住民的母语，如：卡达山杜顺语（Kadazandusun）、毛律语（Murut）、拜丹语（Paitan）、伊班语（Iban）、比达友语（Bidayuh）等等。除了上述的各族母语外，英语在官方场合与民间也仍具地位。

至于马来西亚华（汉）族籍贯则以广东与福建人为大宗，因此在当地常有机会听见的华（汉）语族语言，包括泉漳话、客家话、广府话、潮州话、福州话、兴化话、福清话、广西平话、官话等。只不过最近的这三十多年下来，非官话华语族语言却急速式微，如今已处于濒危之际了；可相反地，官话却一枝

独秀、日渐抬头。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必然还是使然？这是非常值得深思以及仔细去探讨的问题，对此本文将论述促使此局面发生的缘由，还原这起事件的面目。

（一）研究目的

曾几何时，从政治（选举竞选演说）、经济（经商买卖）、文化（中国南方戏曲）到教育（非官话华语族语言私塾），非官话华语族语言在当地华族的日常生活中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不少主要的城市，非官话华语族语言除了通行于华族之间，更可以之与友族沟通——槟城的马来老伯以流利的泉漳话与华裔老朋友闲聊；来自孟加拉的外劳在怡保用广府话向食客点餐；新山的淡米尔妇女在巴刹以潮州话讨价还价。非官话华语族语言在当地使用情况视乎很是蓬勃；尽管如此，非官话华语族语言在当地实际上却正在面临失传的窘境。

要使一门在政治、经济及文化的舞台上都如此活跃的语言由盛转衰，若非其使用群体的人口遭到了灭顶之灾，那就肯定是官方与统治者所计划引导的。无论如何，这些都不是非官话华语族语言在马来西亚遭遇的情况，是什么原因促使当地华族大规模地改换母语，而华社的这项抉择是理所当然还是背道而驰？另外，本文亦欲针对华社给这场运动的正面评价作出检视，反思这整个过程之中又有些什么后果及影响是长期受到忽略而从未被提起的？

（二）研究范围及方法

在研究架构方面，本文会依两个主要的方向而分作二章处理。首先以文献综合研究的方法搜集马来西亚华族对官话与非官话华语族语言的理解及其之间的关系，并对本主题的核心关键词如“华语”、“官话”作出解释。这对了解当地华族对华语族语言的语言观念之现状有着重要的作用。接着在同一章里分出第二节，以调查法研究前述的观念中的准确性与华语族语言在当地的历史全貌。因此，本文首章将举出马来西亚华社对非官话华语族语言所持有的种种误解，并进一步厘清真相。

本文的研究对象确定为马来（西）亚之华裔群体，时间跨度则专注于马来亚结束紧急状态之后至同一世纪末，前后相当于四十年的时段，不过在此之前的特定时期也会予以关注。本文对此将在第二章对史实的观察，并以定性分析的方法，对获得的各种资料与材料进行分析与综合探究影响了马来（西）亚华族改以官话作为母语之主要因素。

（三）研究难题

就资料而言，关于马来西亚华社“前官话时代”（Pre-Mandarin era）的语言使用情况方面的资料相当匮乏，大多数的研究者都选择着重于探讨官话在“讲‘华语’时代”以来的发展与展望，而省略对此时间段改用官话的情况加以分析。接着，就算有关非官话华语族语言的研究，大多数都是从语言学（以三代人传承母语的情形）的角度，来说明非官话华语族语言在马来西亚的衰败

走势，而鲜少会去对这种形势背后的因素作出详细的分析，这些资料一般都只会以外部的因素——官话占华语圈的最大市场、非官话华语族语言在国际上的地位不高、中国崛起——来解释这一切，而忽略了当地华族的主观态度。本文也会加强对华族主观态度此块领域，多加分析。

（四）前人研究综述

针对“华”字构成“华语”、“华人”等词之历程及其往后的发展情况，马来西亚语言学家邱克威（2018）指出“华”与“汉”——初起十八世纪中叶，一直至十九世纪——从朝鲜人编写的华语教材及南洋华社的早期文献中能够发现这两字就已出现词义的分工了。这有助于本文在接下来的章节厘清“华语”一词在使用上的准确性，以解除在讨论接下来的议题时所可能对本文造成的不必要之歧义。

在探讨马来西亚华族对非官话华语族语言的误解方面，陈良（2011）的《大马华族文史正论》是一本蛮重要的著作。这本书收集了作者从2009年7月3日至2010年4月16日在《东方日报》发表的18篇文章，同时附上其他作者的9篇评论。书中的文章及评论都企图灌输“官话作为大马华族共通语是天公地道，变成母语更是理所当然”之观点，这些篇章在了解当地华族对非官话华语族语言抱持的误解与偏见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张光宇（2019）将语音、音系、历史语言、音韵、和华语各语言交织起来，描绘华语语音的发展史。作者的可取之处在于结合了文献拟测与

语言重建两派的作法以达到更完整的华语语音历史发展面貌，当中他也提出了历史事件的重要性。作者指出在中国的历史上，分别于西晋末年及北宋末年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中原汉人南迁移民运动，南迁移民与之后的北方人在语音上的其中一项特色就是保留了入声。无论如何，华语语言的差异从远古时代就存在，当权者也一直想方设法透过文教的推广来促进统一。

接着，台湾语言学家洪惟仁（1992）则探讨中华民国政府的语言政策对台湾闽南语所造成的影响。其中，作者在其著作当中对台湾闽南语作为语言或方言作出了讨论与分析，他这一举动本身，即已说明了一个人的认同感对语言的身份或地位也有密切的关系。

日本学者今堀诚二（1974）专注研究马来亚华族的早期社会，这些资料显示了华族在马来亚最初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面貌。通过今堀诚二的研究，可以了解到早期的马来亚华侨已经有相当成熟的社会组织，并且有效地维持其社区的秩序。

接下来，许甦吾（1949）、王秀南（1970）、郑良树（1998）及颜清煌（2017）则详细地记载了东南亚地区的教育发展历程，华文及其他语言源流的教育制度都包括在其中。这些资料当中的一项最重要铁证是揭示了在官话未成为华文教育制度的教学媒介语之前，非官话华语族语言一直是当地华族受教育的语言。

洪丽芬（2008）通过对吉隆坡 5 大籍贯背景——泉漳、广府、客家、潮州、及海南——的 3 代华裔对其母语的掌握与转移现象作出了系统性的统计，此外，

作者也试图解释马来西亚华族母语转移现象的原因。洪丽芬称马来西亚的政治政策以及不同籍贯的华族群体相互通婚是造成这种母语转移现象的主要原因。

根据上述研究，可以发现关于这些议题，前人关注了影响马来西亚华族改换母语的客观因素，却没有关注华族本身的主观心态。马来西亚华族的主观心理与性格研究方面较为匮乏——这亦是本论文需要着力处理与解答的问题。

第二章 马来西亚华族对非官话华语族语言的误解与真相

非官话华语族语言在马来（西）亚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不过究竟有多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多少年前，这就并非人人都答得出来了。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普通人对非官话华语族语言的认识其实并不深，甚至带有不少的误解。因此本章首先就有必要先探讨当地华族对非官话华语族语言普遍上都抱持着那些误解，继而揭示真相。

官话成为马来西亚华族之间的第一大母语在今天来说已经是无可争议了，但之所以说“成为”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事情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这样，而是后来才发生的。一般人当然知道这一简单的事实，他们应该也还知道此前的大马华族都以自身的乡音为母语，但若要问人们这样的转变为何会发生，恐怕大部份的人就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甚至从来都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这就成为本章接着须要解答的问题。

（一）马来西亚华族对非官话华语族语言的误解

关于非官话华语族语言，马来西亚的华族往往都听闻过一则大同小异的传说：“方言”是无法用文字来书写的，她（们）是水准低的，所以只存有口语形式。除了此一最基本的论述以外，他们之中有些人甚至还会进而“解释”：

“方言的字”是由秦始皇当年统一六国文字的时候所“灭掉”的。此为当地华社一般上就非官话华语族语言所了解的“客观事实”。

首先，本文必须先为“华语”这个名词正名。“华语”一词在今天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指的是语言学上的官话（Mandarin），同时分别对应现时中华民国之国语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谓“普通话”。将官话称之为“华语”常常造成了认知上的混淆，尤其是在论及华族的语言问题时，不少人就会认为：既然是“华”族，那就一定要懂“华”语，否则怎么算得上是个“华”人。这个说法从表面上来看感觉合理正当，但若认真考究就会发现其相当荒谬。一般人都知道早期移居南洋的华族往往都只通晓各自的族群母语，若按前述的道理来说，这些前人岂不是没有资格当华人？

据武春野（2014）所查，中国对“官话”一词最早的文献记录始见于明代，并一直沿用到 20 世纪 40 年代。（武春野，2014，页 21）这个所指的文献就是明代人张为在其《问奇集·各地乡音》中载：“江南多患齿音不清，然此亦官话中乡音耳。”¹，当代的学者都据此相信明代就已流行以“官话”来指称这个语言了。另一边厢，从十九世纪末的南洋华文语料中则可看出“华语”一词在当时的意义为何，如陈省堂《越南游记》就以“华语”一词来泛指“闽粤潮琼各籍语言”。²杨贵谊（1990）也曾指出华语指的是马新华族所使用的语言，当中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谓“普通话”以外，“也包括华族社群中所通行的各种”华语族语言；（杨贵谊，1990，页 479）许维贤（2018）对此表示：

¹叶宝奎：《明清官话音系》，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3 页（转引自武春野：《“北京官话”与汉语的近代转变》，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 年，第 21 页）

²载《叻报》1888 年 5 月 8 日（转引自邱克威：《马来西亚华语研究论集》，华社研究中心，2018 年，第 243 页）

1980 年代以降，新加坡从事华语教学的语言学家为了配合官方“讲华语运动”之“多讲华语，少说方言”的意识形态，透过诸种著述和演说落力把华语“官话化”，将非官话华语族语言从华语的含义排除出去。（许维贤，2018，页 37-38）也就是因为新加坡当局的刻意使然，导致了“非官话华语族语言不是华语”的怪象。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事实上在 1980 年代以前，中国大陆的华语语言学界还有以“北语”、“北方话”、或“北方方言”来指称“官话”这个语言。若从字面上来观之，前者以该语言的发源与核心流行地区命名（即如同闽、粤、湘、吴等华语族语言一般），确实更为客观及准确；相反后者为北方话冠上“官”字之命名方法则带有政权沙文——即受掌权当局主观偏好及利益，而非客观准确的事实来为事物作出诠释与定义——与北方中心主义的性质。无论如何，本文在此为“华语”界定为：包括官话与非官话在内的所有华语族语言；而马新两地习惯指的所谓“华语”，则姑且以“官话”这一目前于学界较为通行的名称来称之。

接着，本文将整理出马来西亚华族对华语族语言的各项误解，并厘清事实。不过要办到这一点却会面临一个问题——由于是谬误而非事实，这些言论往往都只流传于坊间，鲜少会被学界认真看待，所以要搜集这类观点的文章或书籍非常不容易。所幸，大马华文界却传有一本由陈良（2011）所著的《大马华族文史正论》。这本书的重要价值有二：作者的身份及著作的内容。第一、陈良是一名大马的“文史工作者”，其所专注的领域为当地华族的语言与教育，对华教方面的议题发表过不少的看法，其言论可视为“华教人士”的观点；第二、虽然为一人所作，但作者所表达的内容却包罗了大马华族对华语族语言的代表

性观点，可谓是对这些谬论的“集大成”。因此本文批驳这本书的观点，亦即在批驳当地对华语族语言充满误解的一般华族观点。

首先来探讨华语作为语言或方言的问题。在〈析语言现象 剖自大心态〉一章下的“闽粤等语言是汉语方言”这节内的第二段,陈良表示:

除了因为大量的词汇可与古书互相相印证外，从音韵系统来看闽粤等语，会发觉它更符合中古时代的切韵系统，这点从清朝至今不少学者做过论证，有的甚至推溯更远，认为闽粤语更符合先秦古音。

据此可见，闽粤等语言作为汉语方言是无疑的，……（陈良，2011，页 10）

作者应该更进一步地说明，闽粤乃至其他的五大华语族语言其实都源自上古华（汉）语；换言之，这七大华语族语言皆属于同一**语系**——华（汉）藏语系——下的同一**语族**——华（汉）语族。七大华语族语言同属一个语族，就代表他们是华语的方言吗？在语言学上，英语及德语同属印欧语系下的日耳曼语族，难不成英语及德语就应该要被视为“日耳曼语”的方言？答案显然不是，所以陈良草率地以闽粤等语言“大量的词汇可与古书互相相印证”、“更符合中古时代的切韵系统”、“更符合先秦古音”来将各华语族语言解释为方言，是缺乏论证与逻辑关系的。研究华语语音发展史的语言学博士张光宇也明确地指出“吴语、粤语、闽语、官话方言之间的差异如同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彼此的差异”（张光宇，2019，页 529），因此本文坚持认为将七大华语族语言视作同属一语族的**七个独立语言**绝对是合情合理的。

陈良不提“语系”、“语族”是因为他不了解还是有其他原因，这一点就不得而知，不过他之后又仿佛感觉若只单纯以语言学的角度来解释七大华语族语言之间是“方言”的关系视乎会站不住脚，于是在〈剖语言分流析方言关系〉章下之“自古标准语为方言共准”节内提出了“三大要素”来“补救”，这“三大要素”如下：

第一，中国自古以来文字的统一，使殊地异音的方言统之有元，会之有宗。

第二、中国自古便有标准语为各地方言所共准。

第三、中国历史上强大的政治统一，使汉语体系维系于不坠。（陈良，2011，页 15-17）

为了不让其论述在语言学上被击垮，作者就只好提出了上述以政治角度出发的“三大要素”。作者以强烈的措辞——自古以来、自古便有、历史上强大的一一来作为其支撑七大华语族语言是华语“方言”的理据。

关于“自古以来文字的统一”，事实上洋人传教士为了方便向华族传教，自 1810 年代在马六甲就已潜心创制出以拉丁字母替代汉字来书写各华语族语言的文字——教会罗马字，（陈慕真，2015，页 1）截至 1915 年至少已出版了二十一个华语族语言的方言福音。这就证明汉字绝不是用以书写华语的唯一文字，并同时推翻了“自古以来文字的统一”之论。

对于“自古便有”这个论点，就不得不问问作者：中国历史上自古以来，自古便有皇帝，可后来又怎么样了？事实上，中国自古是没有一个完全通行于全国的语言才对，而最多也只有在特定地区流行的语言而已。这也就是为什么清末民初开始一直时至今日还须要无时无刻地特意强调推广国语或“普通话”（官话），若中国真的“自古便有标准语为各地方言所共准”，那就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最后，作者试图以“中国历史上强大的政治统一”来给各华语族语言套上“方言”这个身份。根据这个道理，陈良也就刚好证明了各华语族语言不作为方言的原因了，因为中国大陆脱离中华民国的统治已经长达七十年之久，“政治统一”也就早已不能成立。这七十年来，中国两岸不止在语言的词汇与口音上自然分化，对语言的观念及认同感也一样出现了变化。最明显的例子即台湾的语言学家都不会再将当地的闽南语视作方言，如洪惟仁就明言指出：“台语，无论是鹤佬语、客家语、山地语、它都是一种语言，不是方言。”（洪惟仁，1992，页 61）除了词汇与口音的自然分化，中共当局更于 1956 年 2 月 1 日开始几乎全面废除传统汉字，在中国大陆强力推行“简化字”，无视中国大陆以外的中国地区仍然使用传统汉字的习惯，这就再次否定了作者陈良之前所述的“中国自古以来文字的统一”这一点。

还有一点也非常值得指出，陈良所举的“三大要素”都是以“中国、中国、中国”为基准，这又要问问他了：马来西亚是中国的一部分吗？不是；中国对马来西亚拥有宗主权吗？没有；马来西亚的政治、历史、文化、及语言环境跟中国一样吗？不一样。就此看来，时至今日中国仍将七大华语族语言硬划成

“七大华语方言”，是出于维系党国的完整性之政治因素驱使所然，但这又与
大马华族何干？因此大马华族绝对没有必要配合接受中共当局的论述。

其次，关于“‘华语’不是华人的母语”这一点，每隔不久就会引起华社
民间的争议，陈良本身对此也表示“实在令人厌烦”。（陈良，2011，页27）
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好厌烦，更无需争辩，官话不是大部份马来西亚甚至全东南
亚华族的本母语是毫无争议的事实，只要承认大马华族的原母语是非官话华语
族语言即可，只不过这对于“华教人士”来讲却是犹如一颗极其难咽之丸；比
如陈良在其书中完全没有指出这一简单明确的史实，相反地却提出反问：

1956 年以前国语教育已推行全国，作为民族标准共通语，你如何判定它没
有涵化成南方人的母语？别忘了二战后至 50 年以前仍有大批南移的南方汉人，
不然当年马星为数众多的中文报刊书籍、学堂夜校等要如何经营，这又须有多
大的群众市场才能撑起如此蓬勃的文教事业来？（陈良，2011，页20）

作者虽然试图避开问题的核心，不过他的提问本身还是间接地默认了非官话华
语族语言才是马来（西）亚华族的原母语；因为官话并非南方人的母语，所以
绝非被继承下来的，而是要靠“涵化”才能成为南方人的母语，“‘华语’是
不是华人的母语”的问题也就自然地水落石出了。至于之后的那一句，“中文
报刊书籍、学堂夜校等要如何经营”与官话有没有涵化成南方人的母语实则并
没有实质的关联。因为早期的华族只须要懂得华文书面语的语法与词义即可撰
写文章，同时读者也能够以非官话华语族语言来阅读华文书籍报刊；而学堂夜

校的存在说明早期华族是须要刻意去上课来学会官话的，反而更加证实了官话并非当地华族最初的母语。

陈良之后又引用《叻报》于 1918 年 1 月 19 日第 13 页的一则报导：

吉隆半山巴中华辟智学校……学生多客籍，而校长训词及毕业生答词，皆操普通话，绝不用方言，亦一特色也。

作者进而称：“可见早于‘五四’以前，已有学校通行‘普通话’了。”（陈良，2011，页 22）本文必须指出，尽管“五四”前出现了以官话为教学媒介语的华文学校，但其绝非当时华文学校的主流。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以非官话华语族语言为教学媒介语的华文学校肯定比前者流行得多（这一点在下一章另作讨论），而报导中将中华辟智学校的这一情形形容为“亦一特色也”，其实也就证明了其在那个时代是多么地罕见的了。

这些即华社民间对非官话华语族语言的常见误解与执念，本文亦竭尽所能地纠正了各种谬误。若前述观点据以久持，人们就自然对非官话华语族语言产生负面的看法，这种负面的看法愈趋极端，则甚至能影响一个人对过去的认知。这里要指的是当地华社可能因对自身母语的反感，从而否定非官话华语族语言在这片土地上所达到过的成就。

（二）非官话华语族语言在马来（西）亚的实况

如果不说出来的话，应该很多人都不会刻意去想这件事——那就是官话作为当地华族的母语，远远不及非官话华语族语言的时间长。那非官话华语族语言在马来（西）亚的历史最早究竟可以追溯到多早以前呢？

早在四百多年前，我们就已经得以从葡萄牙人伊里斯在 1613 年所绘制的《马六甲城市图》之中发现到华族在本土的足迹了。（张礼千，2013，页 178）图里标示出了好几处与华族有关的地点，其中包括了“三宝山”、“中国渠”、及“中国村”等，不过最值得我们关注的还是“中国村”与“中国渠”之间的“Porta dos Chincheos”——“漳州门”；“Chincheos”即葡萄牙人试图以葡萄牙语来发“漳州”二字的读音，这也就清楚地表明了漳州人不止在时间上来得早，而且其规模也必定不小，以至于能够让葡萄牙殖民者在地图上标示出来。四百年后的今天，许多从马来语或英语翻译成华语的地名，都仍然可以清楚看出非官话华语族语言的痕迹。比如英语的“Road”被音译为闽南语或粤语的“律”，如霹雳的“打巴律”（Tapah Road）、槟城的“庇能律”（Penang Road）、吉隆坡的“怡保律”（Ipoh Road）等；马来语的“Bukit”、“Pulau”及“Sungai”则依闽南音分别音译为“武吉”、“浮罗”及“双溪”，如吉隆坡的“武吉免登”（Bukit Bintang）与“武吉阿曼”（Bukit Aman）、吉打的“浮罗交怡”（Pulau Langkawi）、槟城的“浮罗池滑”（Pulau Tikus）、雪兰莪的“双溪毛糯”（Sungai Buloh）、吉打的“双溪大年”（Sungai Petani）等。

接下来我们不禁要问，早期南来的华族祖辈因为说着被当代人认为“水准低”的语言，他们是否因此而活得卑微及一事无成？我们将试图透过政经、教

育、与戏剧这三方面去论述华社在“非官话华语族语言时代”的社会状态，以洗脱一般人对大马华社“前官话时代”的种种误解或错误观念。

2.1. 政经

首先我们必须留意的一点是，早期马来（西）亚华社的各领域并没有一个清楚的界限，大部份的团体组织基本都呈现出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交织网络（稍有常识的人都肯定知道，就算是在今天，政治与经济也并不可能完全脱离关系，甚至是越来越密不可分）；无论如何，这并不影响我们检视华族在“前官话时代”的生活。

在政、经、教这三个领域之间，经济是最早站稳脚的。以马六甲为例，泉漳商人很快就通过青云亭的设立，确立了商业基尔特（guild）的地位，即其作为马六甲市内罗致所有商工业者在同一旗帜下，而又兼具主持市政府的团体。

（今堀诚二，1974，页 4）换言之，早期的青云亭是当地华侨政经合一的最高领导部门；而这一部门的领袖所使用的头衔，就是一般人所熟知的甲必丹。甲必丹自 1641 年由荷兰殖民政府委任，直到英国殖民者取代荷兰人后，甲必丹才被废除；不过这并没有改变青云亭作为当地华侨的政经中心，而是改由华侨侨长自称为亭主，继续管辖华侨。（今堀诚二，1974，页 17）

除了行政上，青云亭还在司法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如今堀诚二就说了“亭主每周二次以青云亭为法庭，举行裁判、调停，众亦服其判决；商业基尔特的秩序，亦赖以维持”。（今堀诚二，1974，页 31）从马六甲历任甲必丹来看，除非原籍未名，否则必是泉漳籍（黄存燊等，2006，页 178-198）。

以祖籍福建永春的亭主陈明水为例，在经济上“是马六甲首屈一指的商业资本家；是胶园、椰园、锡矿的经营人；财产之多，据云是多到无人可计算。”（今堀诚二，1974，页22）马六甲早期华族在的表现就证明了华社并没有因未进入“官话时代”而在政经上停滞不前，而是很早就懂得有系统地处理与规划社会了。

2.2. 教育

接下来看看非官话华语族语言在当地华族教育上的地位。“华文教育”在马新两地于今日而言，指的是以官话为教学媒介语的教育制度。对当代的大马华族来说，以非官话华语族语言作教学媒介语，几乎是闻所未闻，无比陌生的，因为这样的教育制度是不存在的；非官话华语族语言也因而不怎么受到重视，被视为“水准低”的语言。事实上，以非官话华语族语言作教学媒介语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今天的香港就仍然是以广府话教学的。不过更重要的是，以非官话华语族语言为教学媒介语的教育制度也曾经同样存在于马来（西）亚。

根据布莱恩·哈里逊（Brian Harrison）的资料清楚地记载，来自苏格兰的——基督新教公理宗下所属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威廉·米尔尼（William Milne；中文名：米怜）于1815年8月5日在其马六甲居处的底楼开了一所男子学校。（Harrison, 1979, 页24）这是一所由一名华裔老师教授阅读、书写及算术的义学（Free School），最重要的是，这所学

校上课的教学媒介语为泉漳话。第二年，他又为说广府话的学生相继开了另一所相似的学校。

接着在与柔佛一海之隔的新加坡也相继设立了不少以非官话华语族语言为教学媒介语的学堂。另一名——来自德国的——传教士汤生（Rev. G. H. Thomsen）则记录了他于 1829 年在当地所见到的三间华校，一间是以泉漳话教学，而另外两间则是以广府话教学。（Song, 1967, 页 26）1834 年圣公会牧师戴拉（Darrah）接收新加坡书院转办义学，并创办了泉漳、潮州、广府三种非官话华语族语言的授课班。（王秀南, 1970, 页 117）1854 年，一间规模较大的私塾——萃英书院——诞生了。（王秀南, 1970, 页 116）马新华社为设立这间义学，总共筹集了近万元叻币；一落成后，萃英书院就迅速成为当地著名的华校，据称每天都有一百名学生上课。（颜清煌, 2017, 页 78-79）这间义学之所以受欢迎主要就是因为其以泉漳话教学、用新式教科书法，而且还完全不收费。（郑良树, 1998, 页 21）进入 20 世纪 10 年代，新加坡福建会馆创立了崇福女校。这间学校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该校以泉漳话授课，但同时也另设英语和官话为特别科目（许甦吾, 1949, 页 48），这绝对是确确实实的母语教育之典范。

在东马砂拉越方面，古晋甘蜜公会在 1875 年开办了一间潮语学塾，这是全古晋最早的私塾；宣统年间，有间被人们称为“锡舍”的泉漳语学堂；另外，有一间创设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客语学堂。同样在砂拉越的诗巫，1907 年创立了一所名为“云湖庵”的私塾，其塾师以泉漳话教学。（郑良树, 1998, 页 65-67）

据说 1884 年，叶亚来在吉隆坡创立了当地的第一间华文私塾，其位于谐街（南益大厦现址）。（李业霖，1997，页 139-140）李业霖表示这所学塾“充满客家人影响”，所以其教学媒介语想必是客家话。

2.3. 戏剧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是华族下南洋的高峰时期，这些离乡背井远走到千里以外的早期移民确实都并不是些什么富裕的人家，而且教育水平应该也不怎么高，但这不代表他们一定是苦闷地生活，相反地，这些早期的华族移民都有丰富的娱乐节目。对当时华族移民最大的娱乐莫过于观赏戏曲，而这些戏曲的演出语言当然就是各语言群的母语。

在华族的传统信仰观念中，“敬天法祖”是重要的思想，对神明与祖宗必须真心诚意，祭祀时更是要敬神如在。对此，除了准备丰盛的祭品以外，在重大的传统佳节期间更会邀请戏班来演出歌舞戏剧，以祈求生活平安喜乐、五谷丰收，或者是报答神明实现愿望。（尚心悦，2019，页 39）各大华族庙宇的对面都会有一座戏台，就是为了这个原因而搭建的。这些专为酬神而演出的酬神戏，最少三、四天，多至一个多月也有。这些戏剧的演出除了达到了酬谢神明的目的，同时又娱乐了人们。王静怡（2003）就指出，不同地缘的华族会沿用各自原乡的地方剧种演出酬神戏，而当中就包括了泉漳人的闽剧、高甲戏、梨园戏、歌仔戏，潮州人的潮剧，广府人的粤剧，客家人的汉剧，海南人的琼剧，各籍贯的地方剧种在马来亚蓬勃发展，呈现出了百家争鸣的景象；对酬神戏的高需求不仅吸引了大量中国戏班前来出演，更促使了当地的华族学戏、自创戏

班，很多社团设立了自己的戏剧小组，以为各自的社团或语言群酬神演出，使得中国的传统戏剧在当地生根、发芽、成长起来，成为当地华族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王静怡，2003，页 34-35）

中国戏剧在马来亚的演出状况甚至也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比如曾于 1851 年至 1856 年任职于檳城警察队，1856 年至 1861 年任新加坡海港局总监的英国官员丹尼·韦汉（J. D. Vaughan）就在其 1879 年出版的《海峡殖民地华人的风俗习惯》（*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中就曾对戏剧的伴奏、道具、戏服、角色表演、演出场所、及戏票价钱等多方面都作出细腻的描述。他注意到了中国戏剧以打击乐器为主，这与西方歌舞剧以管弦乐为主的风格截然不同。道具都很简单，不求逼真，而是象征性的。戏服则非常讲究，从冠帽、衣衫、甲靠到裙襟、鞋靴，不同的人物都有不同的行头，甚至衣服上的鸟兽花卉的图案都有各自不同的意义，要严格区分，毫不马虎。演出场所可分露天戏台与室内戏院二种，他注意到露天戏台的舞台设计和布景较简单；室内戏院的特色则是有观众席，舞台有幕布和供演员上下的两扇门，而里面的气氛轻松、自由、热闹，甚至可以说是秩序混乱，但到精彩之处都是鸦雀无声，然后大声叫好。戏票价钱一般介于五分至一元不等，是大众化的价格。在角色表演方面，他竟观察得出中国戏剧中丑角、童角、及男旦不同角色之分；他认为丑角与男旦的表演很具难度，需要较深厚的功底，也最吸引观众，能让他们看到如痴如醉；而令他个人感到印象最深刻的则是丑角，他将他所亲眼观赏的丑角直比两位英国著名的诙谐剧演员——约翰·鲍德温·巴克斯通（John Baldwin Buckstone）及威廉·奥克贝瑞（William Oxberry）。（Vaughan, 1971, 页 87）韦汉虽然没有记录下他所看到的戏剧剧种，但是有学者从当时的

年代以及前者在马来亚的活动地点和其所描述的演戏特色来推断，韦汉看到的应该就是属于闽南传统剧种的高甲戏和潮剧。（王静怡，2003，页 16）

20 世纪 2、30 年代以后，人们不再需要等到酬神的时候才有得欣赏戏剧，因为专门为演出戏曲的戏班与戏院在这段时期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地出现——吉隆坡有普长春戏院与戏班专演粤剧、可容纳一千六百名观众的檳城万景戏院、怡保和文冬埠也有演粤剧的戏院等等。另外，更出现了一种综合性的表演场所——游艺场。游艺场中设有戏台及娱乐、游艺设施，吸引了当地的各族民众前往游艺；著名的游艺场就包括了吉隆坡的中国游艺场和安乐世界游艺场，檳城的新世界游艺场和大世界游乐场，马六甲的极乐园游艺场，太平的加冕游艺场，怡保的银禧游艺场。各大艺人和戏班都争先到这些游艺场演出。王静怡（2003）更直指这些大型的游艺场等乎中国宋代的勾栏。（王静怡，2003，页 40）

从政经、教育、到戏剧这三个领域，本文所举出的种种证据都已表明了马来（西）亚华族即使在未接触官话以前也一样生活得非常舒适；这段时期的华社政治平稳安定，司法公开严明，经济迅速起飞，教育逐渐发达，文化事业也相当繁荣。“说非官话华语族语言就象征落后，学好官话才能进步”的谬论也就不攻自破。

第三章：马来西亚华族改以官话作为母语的因素

非官话华语族语言随着华族踏上马来（西）亚这块土地开始，就已经逐渐往各个方面的领域发展。在官话远未到来之前，华族都能够以南方诸语处理政、法、经、教的大小事务了。既然如此，这就不免令人好奇究竟是什么原因迫使之后的华族改换母语，而这股改换母语的潮流又是从何而起，并且在什么时候达到高潮的呢？难道非官话华语族语言尚具有某些不足之处，无法满足后世华族的需求；而官话却正好弥补了这些空缺？这个关键谜团，本文即将在以下详细探讨。

关于马来（西）亚华族改换母语的因素，学界也已提出过了不少的说法。本文将针对前人提出过的一些推断进行分析，同时也提出几项个人的见解。

（一）接触与通婚说

自 1958 年开始，马来亚政府对国内华族新村的管制已逐渐放松，许多新村村民都可以自由进行各种社会经济活动。（马来西亚华裔族谱中心，2010）两年后（1960 年）的 7 月 31 日起，政府更结束了紧急状态，新村村民自此也能够正式不受限制，自由地行动了。（马来西亚华裔博物馆，2013）有了自由行动的权利，全国各地很多的华族开始离乡背井，往城市发展、寻找工作，谋求更好的生活品质。在城市里，来自不同语言群的华族开始相互接触与认识，为了

互相沟通与交流，他们就必须选择一个共同的语言。官话是否自此开始成为华族各群的社会共通语，并涵化成新一代华族的母语？事实并非如此，从雪兰莪中华总商会在 1980 年 3 月 22 日成立“雪隆推广华语工委”的这项举措就可以断定，官话在 80 年代以前并非华社的主流用语，因而才需要刻意推广官话。那 80 年代前的华社以什么语言为通用语呢？在未推广官话之前，其实各个城市地区早已有各自的强势语言与通用语，如伍连德（1959）就曾指出：

那里占了大比例的泉漳人，（他们）拥有多数的地产与生意，因此不同群组的小孩除了自己的语言也都会说厦门话。在学校里，因为书记与教师大多都是泉漳人，男女们都学习厦门话，因此马来语在檳城虽被视作共通语，如今说泉漳话的人却多过说马来语的人了。同样地，我之后也得知了，在霹雳的矿区，客家话和广府话成为了共同语，因为那里大多数的华族都以之为语。（Wu, 1959, 页 587）

这就说明了当地的少数群体，乃至从外地前来工作或生活的人自然都会配合多数人或入乡随俗，学习当地的社会共通语，所以不同语言群的华族接触并非造成华族改以官话作为母语的主要因素。不过有学者在不同语言群的华族接触的论点上，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说法。

有学者则认为，是由于不同语言群的华族互相接触并通婚，促使华族改变了母语。比如陈李茂就指出：

男方讲一种方言而妻子不懂这种方言。男子多在外工作，妻子则在家照顾小孩子，由于妻子不会说男方的方言，所以也不会和小孩子说该种方言，而家庭里的其他成员，亦会用“华语”和她交流，久而久之，小孩子也不会说父亲的家乡话。（陈李茂，2019，页 381）

这些的说法看似有道理，不过实际上却也不无漏洞。首先，一直到 90 年代以前，华族的父系社会特质仍然非常强烈，普遍尚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观念，乃至今日都还有部分华族禁止出嫁后的女子拜祭娘家的祖先。因此，通婚后的女子往往都会学习夫家的语言，以面对夫家的家庭成员。此外，男子在外工作也会有归家之时，当他们在家的時候总可以与孩子以母语沟通。纵使从完全依照陈李茂的说法来看，那最多也只能解释小孩不再传承父亲的家乡话，并不代表孩子就必须改以官话为母语，因为母亲仍然可以选择以其自身的母语来与孩子沟通。不过需要谨记的是，虽然各语言群的华族确实出现了通婚的现象，但并不代表所有的华族都通婚了，这一点非常重要。许多如今以官话为母语的新生代华族，其实他们的父母都是来自相同语言群的，而且很多的这些父母都以他们的共同母语来沟通。那究竟是什么更合理的因素促使大马华族父母改以官话作为与他们孩子沟通的语言呢？

（二）母语教育的丧失

华文世界一直盛传着一句据说是希特勒讲过的名言：“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先消灭承载它的语言；要消灭这种语言，首先先从他们的学校里下手。”不过经笔者考证，希特勒根本没有说过这句话。那这句话究竟是谁说的呢？查询的结果显示，这段话最早的出现日期及出处是 2001 年 2 月 1 日的一个中国大陆网站。（语文迷，2002）值得注意的是，此内容的发布者在其“引述”的“希特勒名言”之后竟横转刀锋，利落地以一句“当今的中国大学里无论什么专业，英语是必修课，汉语却不是”来作为收尾。对于这样的一句话，其所欲表达之义实已是呼之欲出、相当明显的了。发布者其实也并不至于是将中共当局比作为希特勒，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其重点在于批评这项政策对华语在大学教育的地位所可能构成威胁；为了强化论述的威严，发布者选择效仿中国文人自古以来的巧技——托古，而如此惊悚的言论托付到一名犯下种族灭绝的极恶之魔身上就真的是再好不过了。希特勒没有说过那段话即已水落石出，不过那段话本身又说得怎么样，有没有道理呢？若仔细探讨，那段话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也就是说，失去了学校或更准确地说——有制度的教学体系，绝对会对一门语言造成严重的打击。

华族常说“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因为华族相信有了渊博的知识，一个人就能够找到好的工作，创造未来美好的人生，因此教育对华族来讲是相当重要乃至神圣的。本文在上一章讨论马来亚华族最初的母语教育时即已证实，截至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当地华族普遍都以各自的母语在学校里受教。但 1916 年在中国发生的一件事将影响日后马来亚华族的母语教育，那年 8 月，北京教育界人士成立了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其目的是为了解决国语统一的问题，这也是中国国语运动的滥觞。三年后（1919 年）的 4 月 21 日，又成了国语统一筹备

会，并通过了《国语统一进行方法》。不久后的五四运动又加速了官话在中国的普及，同时也影响到南洋。徐祎的研究更指出：

根据《南洋华侨教育调查研究》的记载，民国十六年至十八年(1927—1929年)，南洋华校无论是幼儿园、中小学还是师范院校均开设了国语、国文或国音课，其中以开设国语课的学校最多，多为每周5~6个课时，使用的教材大多来自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和开明书店。

同时，民国教育部等相关机构也积极推动国语和白话文在马来亚华人社会的普及。1929—1930年，中国教育部通令当时的马来亚各领馆鼓励国语的推广，并规定在学校中不再使用方言和文言教科书。

……到1935年，普通话已成为华文学校的普遍教学用语。（徐祎，2018，页67）

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以非官话华语族语言作为教学用语的华文学校基本上再也不存在了。失去了学校这个据点之后，没得受非官话华语族语言教育的人自然无法以非官话华语族语言去探讨科学、数学、哲学等各学术领域的课题，甚至连用非官话华语族语言来念出报章或书籍的文字都办不到，非官话华语族语言很快地就在学术上失去了价值，自此，非官话华语族语言变得与教育几乎毫无关联。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非官话华语族语言对于把教育看得非常神圣的华族来说也就一点也不神圣了。如此一来，非官话华语族语言对马来（西）亚华族而言就视乎无任何实质的意义，因此也不会特别迫切地想去维护他们。

以非官话华语族语言为母语的马来（西）亚华族自 20 世纪 30 年代失去了在学校接受母语教育的权利之后，非官话华语族语言在教育与学术上的地位确实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但却一直仍然是当地华族在生活上的日常用语，这一点在之前就已指出。不过自 1980 年代以来，非官话华语族语言则受到了更进一步的打压。

1979 年，新加坡政府向当地华社发起了“推广华语运动”，而这场运动所大声倡导的口号为“多讲华语，少说方言”，这就透露了这场运动的意图。非常明显的，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告诉了人们，新加坡政府并非在鼓励当地的华族多学一门语言，而是希望能够取代非官话华语族语言成为新加坡华族的常用语。这股思想很快就影响了与新加坡只有一海之隔的马来西亚华社。

1980 年 3 月 22 日，雪兰莪中华总商会即成立了“雪隆推广华语工委”，当中获得了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马来西亚潮州公会联合会、马来西亚琼州会馆联合会、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全国华校董事联合会、大马华文写作人协会、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南洋商报、星洲日报、马来亚通报、中国报、建国日报、新明日报、星报、及光华日报一众华团组织的支持，致力在大马华社推广官话。推广官话的同时，非官话华语族语言也逐渐被打压。比如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期间，国营华文广播电台——翡翠台（今爱 FM 之前身）——曾经广播了一部以泉漳话、广西平话、广府话、及客家话呈现的谐剧《四喜临门》；这部谐剧广受欢迎，乃至 1964 年马来西亚国营电视台成立后，隔年（1965 年）就被改编成为第一部国产的华族电视剧；这部全马首部国产的华族电视剧在国营电视台上放映了整整二十多年，一直到 1988 年却被官方下令停播，原因是受到了民间华团的抗议，而抗议的原因就是

因为该剧使用了大量的非官话华语族语言。（许维贤，2018，页 37-38）1990 年 9 月 16 日，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青年团“为了贯彻多讲华语运动”，甚至公开呼吁华社不要使用非官话华语族语言。还有这四十年来，马来西亚华文学校一直都严禁师生使用非官话华语族语言，在学校说非官话华语族语言的学生都会面临被老师罚款惩罚的下场。大马华团组织在语言规划上的这些种种反应与措施都对形塑当地华社的语言观与态度产生了深厚的影响，尤其是在造成华族不再重视母语而愿意以其他的语言来代替之。

（三）华族的“务实”性格

对于探讨华族改以官话作为母语的因素，能够发现学界长期以来主要都以时代的发展——不同语言群华族的接触、不同语言群华族的通婚、教育的普及——种种的外部因素来解释。上述的观点纵然有些道理，在某方面也可能说得通，不过距拼凑出全貌仍然缺乏了一个核心关键因素，这个核心关键因素即华族本身的主观态度。上一节探讨非官话华语族语言在丧失学校这个据点这一点时，就已稍微说明了华族对非官话华语族语言的传承态度与这些语言失去实质意义后是有所影响的，而从华族的这一态度转变来看就不难发现华族是相当“务实”的。本文接下来将探讨华族在与教育及语言上展现了其现实性的各个方面。

首先，对于华文教育，马来西亚华族看似非常重视，但事实却未必如此。根据国民型华文中学校长理事会、国民型华文中学发展理事会及马来西亚行动

方略联盟改制中学发展委员会联合发布的《2017 年国民型中学调查报告》就显示，华小生升上中学的去向中，每十名学生只有 1.5 名学生就读华文独立中学、2 名学生就读国民型中学，而剩下的 6.5 名学生都到了国民中学去。（星洲网，2019）关于华族对华教的态度，何国忠就曾如此地一语道破：

华人虽然关心华文教育，可是大部份华人对中文程度的要求只是一般基本的书写与会话，华人要争取的是接受高深教育的机会，以中文为媒介语的呼声反倒被看成追不上时代，就业机会或前途都是家长或学生所不敢忽视的，每一个人都清楚知道一个事实：在马来西亚企业界最主要的语文还是英语和国语。

（何国忠，2002，页 118）

这段论述也就合理地解释了《2017 年国民型中学调查报告》中华小生升上中学的去向，证明华族对教育的态度是极为现实的，绝不抱持多余的感性情感；切实地符合了华族“再穷也不能穷教育”——而非“再穷也不能穷华教”——的思想。

马来西亚华族学生在中学的阶段，就算是在型中或国中都好，他们仍然拥有接受华文教育的机会；不过一旦升上大学之后，除非是到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或澳门，在本国除了中文系以外，他们就再也不会教育上接触到华文了。大马华社确实曾于 1967 年末萌生创办华文大学的理想，不过此理想由于绝大多数的华族学子选择进入国中让大专以华文授课变得不是大势所趋。（何国忠，2002，页 119）无论如何，这些华族学子若对华文确实深感兴趣，他们仍

能够往中文系继续深造。那中学后到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人数是多少呢？据观察与探查就可以知道，当地规模较大的拉曼大学中文系学士学位一期的入学学生数目只有 15 至 25 人左右；相比之下，同校内以华裔学生为主的工商与金融学院下的会计学每期的入学学生人数都保持在 350 到 400 人上下，银行与金融也有 100 到 150 人之间。（王声建，2020）此落差之巨大，即已进一步地印证了大马华族对这类较“实际”、与金钱打交道的兴趣远高于文科；因为对大部份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赚大钱更能显示一个人的成功，因此追求财富即成为大多数人一生中最高的理想。

关于马来西亚华族在教育上之现实性的最后一点，本文即以华小与型中长期面临师资短缺的现象为论据。其实从华族就读各中学的分布比例以及之后在大学的报读科系来看，就不应该对华校出现教师短缺的情况感到奇怪了。对于此问题，华教、华团、乃至全体华社的主要论点都归咎于政府，比如教总主席拿督王超群就曾表示华小在 2019 年缺少九百多位老师，教育部却没有拨款聘请临教，所以造成师资短缺（光华网，2019）；这样的论点只能说是本末倒置。对于华小缺乏教师，华社首先最该检讨为什么会出现缺乏教师的状况才对，而不是责怪教育部没有拨款聘请临教。他之后进而责备教育部没有安排同年六月毕业，已经面试的师范华小组学员替补华小空缺，根本不重视华小师资短缺问题，但他同时透露了此师范华小组的毕业学员其实也只有四百多位。这就可以看到一幅画面：即使这四百多位毕业学员都全数获得录用，华小的师资仍然缺少了五百位教师；也就是说完全填补后剩下的空缺，竟然比所填补的数目还多。一个平日大谈“尊师重道”、在马来西亚有七百四十多万人口的民族却面对师资严重青黄不接的局面，并一味将责任推卸到他人身上而毫无勇气反省，承认

这是华族功利的性格所致。从官话——当代大马华族声称的所谓“母语”——在与英语或国语竞争上都处于劣势、甚至在本身的堡垒都面对缺少教员的情况来看，也就能够清楚地明白华族为何不可能去关注那些被他们视为地位卑贱的非官话华语族语言了。

综合前述各点来看，早在马来西亚各语言群华族接触与通婚以前，非官话华语族语言首先是丧失在学校作为教学的语言，失去了在教育上的基本地位。长期下来，非官话华语族语言在社会上各方面的价值都日渐萎缩，无法与其他的语言竞争。这样一来，他们对“务实”的大马华族而言则变得毫无利益可言，过后再遇上了各语言群华族的接触与通婚等因素的催化之下，当地华族逐渐摒弃了非官话华语族语言，而改以同一语族下的官话——或其他地位价值更高的语言，如英语——来作为母语。

第四章 结语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与时事评论员安焕然曾指出：“马华文化是边缘文化”。在官方认定以“马来—伊斯兰为国家主流文化”的霸权主义意识形态之下，马华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就注定不受当局重视与器重的了。由于不受关注，人们对这些文化的认识一般是模糊、片面，甚至是不准确的。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众——包括华族本身——对非官话华语族语言的认知当中，包含了许许多多的谬误。当中包括认为华语族语言是一个语言、七大华语族语言是这个“语言”下的方言，更有甚者以为非官话华语族语言是官话的方言。

很多对事实不明的人更会犯下“以当代经验与认知理解过去”的错误，以为非官话华语族语言是“低等”的语言，殊不知他们在四百多年前就早已作为政、经、文、教等领域的专业语言了。同时，这种以当代经验与认知来理解过去还会使人掉入“如今的一切都是历史必然”的陷阱，以为官话是自然取代非官话华语族语言成为大马华族的母语，而无法正视长久以来都有各方不同的势力采取种种措施——废除非官话华语族语言、禁止在学校以非官话华语族语言交谈、将非官话华语族语言刻划为水准低、要求电视台取消播映非官话华语族语言节目——引导华社舍弃非官话华语族语言的。

关于这份论文的不足之处，本文认为未来可更深入，广泛地以不同——非主流派——的视角去检视华族内部对语言的多元观点。另外，大马华族对国语、官话、及非官话华语族语言之间所持有的矛盾观点及态度亦为本领域值得探讨与解决的议题。

参考书目

(一) 专书

1. 陈良（2011）。《大马华族文史正论》。蒲种：林连玉基金。
2. 何国忠（2002）。《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3. 洪惟仁（1992）。《台湾语言危机》。台北：前卫出版社。
4. 黄存燊等（2006）。《新马华人甲必丹》。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会。
5. 今堀诚二（1974）。《马来亚华人社会》。檳城：檳城嘉应会馆扩建委员会。
6. 李业霖（1997）。《吉隆坡开拓者的足迹——甲必丹叶亚来的一生》。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7. 邱克威（2018）。《马来西亚华语研究论集》。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8. 王秀南（1970）。《星马教育泛论》。香港：东南亚研究所。
9. 武春野（2014）。《“北京官话”与汉语的近代转变》。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0. 许甦吾（1949）。《新嘉坡华侨教育全貌》。新加坡：南洋书局。
11. 许维贤（2018）。《华语电影在后马来西亚：土腔风格、华夷风与作者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2. 颜清湟（2017）。《海外华人世界：族群、人物与政治》。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13. 张光宇（2019）。《汉语语音发展史》。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4. 张礼千（2013）。《马来亚史地》。加影：新纪元学院。
15. 郑良树（1998）。《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
16. Harrison, Brian. (1979).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7. Song, Ong Siang. (1967).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Malaya Press.
18. Vaughan, J. D. (1971).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 Wu, Lien-Teh. (1959).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Cambridge: W. Heffer & Sons.

（二）专章

1. 陈重瑜（1990）主编。〈华文在多种语言社会中的交流作用〉，《新加坡世界华文教学研讨会论文集》（页 478-482）。新加坡：新加坡华文研究会。

（三）期刊论文

1. 陈李茂（2019）。〈近年马来西亚、新加坡汉语方言使用状况〉。
《方言》，第3期，页380-384。
2. 洪丽芬（2008）。〈试析马来西亚华人母语的转移现象〉。《华人华侨
历史研究》，3月第1期，页32-41。
3. 尚心悦（2019）。〈马来西亚华人传统音乐浅谈〉。《戏剧之家》，
第31期，页39-40。
4. 徐祎（2018）。〈马来西亚华语与华人族群认同的历时共变〉。《文
化软实力研究》，2月第1期第3卷，页62-70。

（四）学位论文

1. 陈慕真（2015）。《白话字的起源与在台湾的发展》。台北：国立台湾
师范大学台湾语文学系博士论文。
2. 王静怡（2003）。《马来西亚华人传统音乐的传承与变迁》。福州：福
建师范大学民族音乐学博士论文。

（五）网络资料

1. 光华网（2019年10月6日）。〈教总促教部开圆桌会议寻方案解华小
师资短缺〉阅自
<https://www.kwongwah.com.my/20191006/%E6%95%99%E6%80%BB%E4%BF%83%E6%95%99%E9%83%A8%E5%BC%80%E5%9C%86%E6%A1%8C%E4%BC%9A%E8%AE%AE-%E5%AF%BB>

%E6%96%B9%E6%A1%88%E8%A7%A3%E5%8D%8E%E5%B0%8F%E5%B8%88%E8%B5%84
%E7%9F%AD%E7 %BC%BA/。

2. 马来西亚华裔博物馆（2013年3月14日）。〈华人新村〉阅自
http://malaysianchinesemuseum.blogspot.com/2013/03/blog-post_14.html。
3. 马来西亚华裔族谱中心（2010年3月1日）。〈马来西亚华人新村〉
阅自 <http://www.mychinesefamilytree.net/ppl/history/486.html>。
4. 星洲网（2019年3月16日）。〈调查报告：明显流失 · 华中人数剧
减 13.74%〉阅自 https://www.sinchew.com.my/content/2019-03/16/content_2023136.html。
5. 语文迷（2001年2月1日）。〈世界现代史上灾难的一天〉阅自
<http://www.yuwenmi.com/duan/126936.html>。

（六）私人通讯

1. 王声建（2020）。Messenger 私信。